

第一國際前後馬克思對拉薩爾派的爭論

段家鋒

——從前期修正主義到現代修正主義

(作者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校東亞研究所教授)

摘要

拉薩爾生年三十九歲，死於一八六四年八月。第一國際建立於一八六四年九月，解散於一八七二年。時間上看，拉薩爾與第一國際應無若何關係。但事實上馬克思在第一國際前後卻對拉薩爾展開無限爭論與攻訐。大致說來，只看見馬克思的攻訐，看不見拉薩爾的反駁。第一國際建立前馬克思對拉薩爾有褒有貶，那以後馬克思只有責難，沒有認同。在朋友書信間，馬克思對拉薩爾表裏的不一致，尤其使學者為馬克思感到惋惜。

馬克思對拉薩爾爭辯問題的所以重要，因為爭辯的是那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之名，而有修正主義之實的問題。馬克思建立國際組織，目的在推翻現制度，「消亡」國家。拉薩爾建立工會組織，目的爭取工人普選權，通過國會立法，由國家協助建立合作社制度，擴大社會保險，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兩人都希望把工人階級悲慘際遇有所改善，馬克思希望用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勵行「無產階級專政」達到目的，本質上是反政府的。拉薩爾希望用普選議會民主制度掌握政府，通過立法改革，消除「工資鐵律」悲慘情形，當然要擁護政府。兩人主張殊途而「不同歸」，馬克思派成爲今日共產主義鼻祖，拉薩爾派則爲後來修正主義及歐共主義濫觴。在共產國度普遍推行「改革、開放」以及戈巴契夫大力倡導「新思維」的今天，回顧第一國際前後此段歷史，殊有意義。

一、拉薩爾生史

(一) 學生時期：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生於一八二五年四月十一日，死於一八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實足年齡僅僅三十九歲，但對德國乃至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黨的建立，貢獻至大。馬克思比他後死十九年（死於一八八三），在他生前和死後，馬克思對他譏評的嚴厲程度，超過對任何人。現在回溯兩人爭論的原委，仍不失為對當代共產黨人路線方向的一個明確指針。

拉薩爾生於德國與波蘭交界處的布勒斯勞 (Breslau) 一個猶太人家，父親赫曼·拉薩爾 (Heymann Lassal)，是經營綢緞業的猶太富商，虔誠猶太教徒。住在這一區域的人，多係深感受壓迫的猶太人。拯救猶太人，打倒不平等，形成猶太人共同性格的主要因素之一。拉薩爾十四至十六歲間寫日記，一八四〇年二月二日，十四歲的日記有如下心聲：

「笨蛋！假如不吃動物內臟就能算是個好猶太教徒，我相信自己是個從遵守儀式到信仰實質都最好的猶太教徒。我發誓要冒生命危險去拯救現在正被壓迫的猶太人。我寧願自己上斷頭臺，也要使他們在這個國家內處於受尊重地位。我的童年美夢，只是手持利劍，領導猶太人恢復他們的獨立尊嚴。」（註一）

一八四六年在巴黎，把受自家族的姓氏 Lassal 在字尾加上 le，成為法國式名字 Lassalle。一方面說明當時歐洲人嚮往法蘭西文明的一斑，一方面也說明他嚮往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精神。（註二）

他是個不可救藥的壞學生，天賦極為聰明，卻把聰明力用在偷懶、說謊、抄襲同學筆記、在成績單上仿照父母親簽字、捏造理由逃學，以及醉心於打彈子和玩牌上。報復心極為強烈，但對朋友熱情，對父母姐弟熱愛，表現極為誠實。他十四歲時自評：「我到底是個好孩子。」（註三）

他的父親不喜歡他學商，但拗不過愛子的要求，一八四〇年五月終於允許他離家赴來比錫上商業學校。老師不喜歡他的聰明狡黠表現，師生關係比在布勒斯勞更差。第二年一八四一年八月離開商校，不足十五歲的他認識自己不是一個學商的材料。於是立志決不巴結權貴，要為民族追求自由，不惜粉身碎骨。他想用文學宣揚自由，因而崇拜海涅 (Heinrich Heine 1797-

1856)，說「我愛海涅，他是第二個我」。海涅大他二十八歲，以後曾一度很喜歡他。但他不了解海涅是自由主義的背叛者，不知道海涅曾說：「我是保皇黨，不是民主派。」（註四）

離開商校回家，經過一年徬徨和自修，考入布勒斯勞大學哲學系，再轉入柏林大學習語言學和哲學。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是黑格爾「國家哲學」在普魯士分化成老年、青年兩派時期，和政治上的保守派與激進派，正相吻合。黑格爾老年派固守黑格爾哲學體系，但拋棄他的辯證法，認為「理念和絕對精神是萬物之源」，肯定絕對精神「在天是上帝，在地是國家」的結論，因而忠於君主政體，承認神的存在，靈魂永不熄滅，科學應與宗教結合。老年黑格爾派代表資產階級保守集團的政治情緒。青年黑格爾派則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代表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想法」，批判宗教，主張無神論和資產階級改革。兩派主張有異，但都走不出黑格爾唯心論的範疇。（註五）

柏林大學生多成爲「青年黑格爾派」，費爾巴哈、馬克思、拉薩爾等都不例外。不同的是費爾巴哈成爲以唯物主義批判黑格爾宗教觀的鼻祖。馬克思批判吸收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觀點，成爲「唯物史觀」的教皇。拉薩爾則始終維持著青年黑格爾的主張，同時採用老年黑格爾的某些觀點，形成他和馬克思思想的根本差異。

（二）由訴訟成名：一八四四年拉薩爾由柏林大學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年十九歲。第二年赴巴黎蒐集撰寫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學說資料，在那裏把姓氏作部分增改。以後返回柏林，申請爲柏林大學講師，成功已經在望，準備全力向學術研究發展。一八四六年一月由朋友介紹認識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蘇菲婭·哈茨費爾特（Countess Sophie Gräfin von Hatzfeldt 1805-1881），改變了他的一生。

哈茨費爾特伯爵（Count Edmund von Hatzfeldt），是普魯士顯赫貴族，和皇室有親密關係。他的家擁有價值五百萬塔勒（thaler or taler）以上財產，這種於十五至十九世紀流行各邦的銀幣，當時價值昂貴。這個家族，享有貴族的一切特權。伯爵夫人也「系出名門」，十五歲時便成婚。一八四五年夫人已三十九歲，育有二子一女，和伯爵間感情破裂。她被幽居在萊茵河邊古堡內，斷絕生活供應及醫藥治療，禁止接見兒女。這種情形下，那年剛二十歲的拉薩爾介入，以仗義執言及打抱不平心態，協助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尋求法律救濟。往後八年的官司搏鬥，使他成爲歐洲名人。這一訟案對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發展

，影響深遠。(註六)

這場官司終於在一八五四年八月獲勝，哈茨費爾特伯爵幾乎在精神耗竭，名譽掃地中認輸。其間經歷三十六個法院審理，最後伯爵付出贍養費三十萬塔勒，伯爵夫人則以她父母名義贈送拉薩爾有生之年每年四千塔勒(有的書說七千)。官司獲勝之後，生活無虞，他再拾起赫拉克利特的學術研究，並投身於普魯士的社會民主黨運動。訟案本屬貴族家庭糾紛，它之所以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發生影響，有以下幾個因素。

1. 訴諸輿論：他傾全力利用國內新聞報刊，訴諸輿論與援。十九世紀中葉，貴族家庭有高度神秘性及不可侵犯性，家族本身男女糾紛尤其涉及緋聞，新聞價值極高。拉薩爾把伯爵夫人形容成被壓迫毆辱、被斷絕生活來源的「無產階級」化身，公諸報端，引起廣大迴響。另一方面，把伯爵家族和私生活的自私黑暗，鄙卑齷齪，盡量予以揭發。爲了增加實證，一八四六年拉薩爾教唆兩個青年朋友與本赫姆(Oppenheim)和門德爾松(Mendelssohn)，去偷竊哈茨費爾特情婦的珠寶盒，相信盒內一定藏有伯爵不可告人的秘密文件。兩人被捕，一八四八年八月科倫阿塞茲(Asisze Court at Cologne)法院判決拉薩爾與奧本赫姆無罪，門德爾松盜竊罪徒刑五年。「拉薩爾在法庭上作了六小時辯護發言，獲得無罪釋放，羣衆把他當作英雄歡迎，讓他騎馬凱旋般地遊遍了杜塞爾多夫城，說明人民反封建勢力的一斑。」(註七)這些消息在報上大量報導，使伯爵完全處於緘默的挨打地位。他的教唆偷竊，反而被稱頌爲「智慧創造者」(intellectual originator)。雖然如此，一八四八年二至八月間，他仍被關半年候審。

2. 從法律中尋求保護弱者人權：拉薩爾把伯爵夫人「渲染爲處於『無產者』地位反抗權貴壓迫的鬥爭，他利用這種聳動聽聞的案件，造成自己的聲譽。」(註八)這一點完全成功。因爲在那個時候歐洲巴俾夫、聖西門、傅利葉、歐文等社會主義者鼓吹勞動者人權，揭露資本家黑暗的學說，瀰漫全社會。馬克思學說初露頭角，一八四八年二月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發表後，爲「無產階級」和被壓迫者講話，成爲最時興口號。拉薩爾介入此訟案後，就說他是爲「伸張「人權」(the rights of humanity)」。但他並不空叫口號，他放棄學術研究，摒除一切雜務，全力就此案投入當時普魯士的法律鑽研，從法律上尋求保護弱者人權。在他官司勝訴後，學者研究他的案例說：「從案例的經過看，不得不私下讚佩，任何法律專家也無法比他做的更好。」

(註九)

3. 馬克思初期對拉薩爾的支持宣揚：一八四八年歐洲爆發大規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德國新興資產階級主張推翻君主制度，把分裂的德意志各邦統一為民主共和國。三月十八日普魯士國王宣佈召開普選會議，是革命風潮的成果。但普選並未真正實行，流亡國外革命者卻紛紛返國參加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是回去者之一。他兩人於四月六日左右離開巴黎回德國，先到美因茲，再於四月十一日到科倫，申請長期定居，目的在辦報組織革命。六月一日「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創刊號問世，副標題是「民主派機關報」。從開始一系列的文章就是呼籲德國人通過革命手段統一德國，說「這是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重要任務」。(註一〇)這分以反政府姿態出現的報紙，當時對拉薩爾曾大力支持。

一八四九年二月至五月間，馬克思曾在他的「新萊茵報」上有四篇專論和許多相關文章，抨擊普魯士政府逮捕拉薩爾的不當。拉薩爾於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杜塞爾多夫附近的諾伊斯民衆大會上演說，呼籲普魯士國民議會和國民「以暴力反抗官員」和「拒絕納稅」，當天被捕。他被控以觸犯「刑法典」(Code Penal)第八十七條和一〇二條罪，最重可判死刑。拉薩爾寫信給馬克思、恩格斯予以辯護聲援，「新萊茵報」遂有一系列文章批評司法機關「濫用職權」和「非法逮捕」。本案於五月三、四日審判，陪審團判決拉薩爾無罪，經過新聞擴大報導，拉薩爾更成歐洲名人。此一案例亦成社會主義運動史中反政府行動的主要例證。(註一一)

(三) 與俾斯麥的交往：拉薩爾是標準的富家纨绔子弟，自幼聰明絕倫，有「神童」稱譽。青年時期風流瀟灑，言詞犀利，娛樂活動如騎馬、擊劍、滑雪、游泳、跳舞、酗酒、賭博等無所不精。中學時期校長面責他「偽君子、騙子、惡劣透頂、狂妄自大。」教員批評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愛、尊敬和感謝。一切出自心靈的東西和心靈本身，對他都是異己的。他不愛任何人，只是需要誰，才偽善的愛誰。」因而拉薩爾一生學術和政治的活動特點，是「堅信自己」。「如果不是堅信自己這個信條支持著我，我會變成一個厭世主義者。」(註一二)

對於他性格的描寫，另一作者說可以猶太文「醜事包」(Chutspo)一字形容。此字義為聰明而輕率鹵莽，果斷而厚顏無恥。更確切的意義是不顧一切的「進取」(Pushfulness)，愛出鋒頭，好鬥成性，野心勃勃，冷酷無情。(註一三)

在這一性格下，所以六十年代初期俾斯麥權力升起時，他很自然的會注意到自己的政治方向，更注意到俾斯麥要做什麼、如何做。他警告當時正與政府鬥爭不休的「進步黨」(Progressives)：「你們想欺騙政府？真正的成功是獲得實在的改革再改革，而不是欺騙。」於是他就從反政府的角色，轉變成為希望以普選修改憲法，以他的理想去改革政治，這是俾斯麥所能夠接受的主張。(註一四)

拉薩爾的策略轉變，始於一八六三年秋間。俾斯麥於一八六二年自巴黎大使任所，調回國出任普魯士內閣總理兼外交總長，兩個人各有御用對方的野心。一八六三年秋天，拉薩爾在日記中寫：「沒有最高的權力，什麼也辦不成。我的年齡已經夠大，不能再做兒童遊戲了。」(註一五)這是他壯年早死前一年的話，哈茨費爾特夫人曾依他的意思寫過如下的話：

在上述兩件事情之間有一條真正的鴻溝：隱蔽的或公開的為敵人工作，或者像一個偉大的政治運動家那樣，抓住機會，從敵人的錯誤中取得利益，讓一個敵人消滅另一個敵人，迫使他們走下坡路，利用對目的有利益的形勢，不管這形勢是由誰引起的。(註一六)

從上面一段話可以看出，拉薩爾除去沒有說「聯合明天敵人，消滅今天敵人」或「既聯合、又鬥爭」等類統一戰線口訣外，他這種「為目的不擇手段」的論調，應該算是共產黨人的統戰鼻祖。

拉薩爾死後十四年，俾斯麥於一八七八年回憶他和拉薩爾的談話說：

我們的關係，完全不可能具備一種政治會談的性質。拉薩爾能夠要求我什麼，又能給我什麼呢？他沒有任何後盾。在政治會談中，盡管人們為了面子不說，骨子裏就是 *Don't touch* (欲取姑予) 這麼一個問題。……他是會同我交往的最聰穎、最親切的人們中的一個，他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決不是共和主義者。他有很明顯的民族的君主主義的意向，他所追求的理想是德意志帝國，他的思想徹頭徹尾是君主主義的。(註一七)

拉薩爾從事工人運動，有工人羣眾為基礎，俾斯麥想運用他的心態，也躍然紙上。這方面在俾斯麥傳記裏可讀到更多類似資料。

俾斯麥傳記作者盧特維希 (E. Ludwig)，認為這兩個地位相差懸殊的人能很多次互相傾心交談，「不是別的，只是天才

的磁性吸力。」(註一八)在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拉薩爾曾訪問俾斯麥十多次，「也許次數還要多些，每次都是談得很久了。」多年後俾斯麥在帝國議會內回憶他和拉薩爾的往來說：「拉薩爾的私人品格，有些地方極其能吸引我。在曾與交往的許多人中，他是最有本事而最爲和氣者之一。他有大志，我們一談就是幾個鐘頭，沒有一次不恨談話告終的。」但俾斯麥也並非真誠相與，他說：「我猜想他一定得了一種可樂的印象，以爲我是一個有睿智而願聽人說話的人。」(註一九)

盡管兩人內心未必都真的是「惺惺相惜」，談話結果對德國卻發生無可估量的影響。拉薩爾不再恃工運勢力反對政府，俾斯麥則採用許多社會黨人當時所主張的進步觀點，特別是改善工人境遇和辦理社會保險方面。社會黨人聯合反對黨用許多期許口號吸引工人，執政保守黨帝國議員問：「我們能怪工人們不擁護不給他們辦事的政府嗎？」俾斯麥立刻指派委員會研究養老和退休俸問題，改善工人生活及工作條件問題。他要求議員們提供意見：「國家處於雇主地位，是否能夠先作一個榜樣，規定工作章程，嚴格執行，讓全國其他雇主們仿效。」(註二〇)

拉薩爾向俾斯麥談的治國大道理，主要包括普選、政府協助辦理合作社，以及有關工人的福利照顧問題。辭退工人，要早先預告；訂定工人基本工資及分配紅利制度；興建宿舍，解決工人居住問題；成立仲裁組織，調解工人爭執；設立工會，解決工人合作分配與信用貸款問題；設立由國家輔助的工人醫院與疾病、傷殘、失業保險。俾斯麥出任首相六個月後，開始這種社會福利計畫並付諸實施，在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年間，毋論歐洲和世界任何地區，都無類似作法，大部分都出自拉薩爾的「獻策」。(註二一)

兩人性格有許多相似處。一八六二年四月，拉薩爾說：「憲法問題其實不是權利問題，而是勢力問題。」同年九月俾斯麥也說：「憲法問題很容易變成勢力問題。」兩人都憤恨他們所屬的資產階級器量狹隘，都好譏諷咒罵。俾斯麥恨強大的奧國，拉薩爾則希望要一個統一強大的德國，想法甚而在俾斯麥之前。俾斯麥三十二歲時開始過顯赫門第所給他的政治生活，那時候拉薩爾二十二歲，卻開始拋棄他的門第所給他的安定富裕生活。拉薩爾早死，想不到死後名字仍長久爲世人所談論褒貶。(註二二)

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萊比錫成立「全德工人聯合會」(General Union of German Workmen)，是他一生事業另一高潮的開始，可惜他的生命已走近尾聲。第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他認識巴伐利亞外交官女兒海倫·寶尼蓋斯(Helene von

Donniges)，熱烈追求。但海倫已訂婚，她的父母全力反對與拉薩爾來往。他竟有能力使海倫私奔他的住處，誓偕白首。拉薩爾送海倫回父母處，認為有把握必可使女方父母欣然同意他成爲佳婿，殊不料海倫在父母勸說下，又入原未婚夫拉科維薩（Radowsisa）懷抱。拉薩爾觀念上反對決鬥，狂怒下要求與拉科維薩決鬥。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決鬥傷下腹部，三十一日死亡，年三十九。他死於第一國際創立的一個月前。（註三）

二、馬克思對拉薩爾的御用聲援

（一）「新萊茵報」的創刊與停刊：歐洲一八四八年二、三月間，連續發生法、奧、德革命，（註二四）據說「在巴黎以馬克思爲首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組織了三、四百名德國工人回德國去革命，其中大多數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註二五）這些人回德以後實際行動究竟如何？本文無追述必要，但馬克思的確於此時回德，辦報鼓吹革命，言論十分激烈。這分報創刊於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停刊於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共刊行三百零一天，中間停刊十五天。

馬克思與恩格斯四月六日離開巴黎，四月十一日到達科倫，籌辦「大型政治日報」。由於馬克思已於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放棄普魯士國籍，科倫市政府允許馬克思請求在科倫限期定居。六月一日「新萊茵報」創刊號問世，馬克思身分是該報主編，同時以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主席身分，參加同盟科倫支部會議。「新萊茵報」是同盟的、歐洲的「民主派機關報」，反對政府，鼓吹農工起義革命，是該報主要方針。創刊後最初幾月論點是：

1. 稱當時內閣爲「辦事內閣」，「由一些庸碌之徒組成，毫無遠見。」說這個政府只會審訊報刊、拘捕，對任何拘捕事件，該報予以攻訐反對。七月分的社論多由馬克思執筆，內容以抨擊非法逮捕爲主。

2. 號召人民拒絕納稅、革命「專政」。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日，恩格斯系列文章鼓吹巴黎無產階級第一次階級戰爭文章。九月十一至十五日，馬克思寫數篇「危機和反革命」，首次提出「專政」問題。說「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我們一開始就指責康普豪森沒有實行專政，沒有馬上實行掃除舊制度的殘作。」（註二六）

3. 七至九月間，馬克思赴維也納參加民主聯合會、在科倫參加科倫民主協會，恩格斯參加科倫附近沃林根各民主團體羣衆

大會，都在會上發表演說，鼓勵羣衆進行組織工作，反對「反革命勢力」，會議情形並在報上大加渲染，因而引起七月、九月科倫檢察機關兩度對「新萊茵報」和編輯人員提起控訴，至次年二月，均判決無罪，益增該報氣焰。

4. 由於恩格斯九月十七日在沃林根大會上演說，公然煽動叛亂，十月三日國家檢查官下令逮捕。恩格斯逃亡布魯塞爾，仍被追逐往巴黎。一八四九年一月中旬，恩格斯再潛返科倫投入「新萊茵報」，馬克思重要著作「雇傭勞動與資本」，於四月發表，恩格斯則於五月發表「反革命的進攻和革命的發展」，都是對現政權和現社會作無情攻擊。五月十日左右，恩格斯制訂萊茵省「起義」計畫，並且「保證勝利」。政府下令逮捕恩格斯，驅逐馬克思。「新萊茵報」於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用紅色油墨刊出最後一號「三〇一」號，說明「新萊茵報被迫停刊」，結束馬克思、恩格斯的「回國革命」鬧劇。(註二七)

回德期間，馬克思曾一再請求恢復國籍，科倫區行政機關關於一八四八年八月三日予以拒絕，說國籍不能恢復，可以考慮向政府申請入籍。他再向內政大臣屈韋特爾(Kuhlwetter, Friedrich 1809-1882)申訴，請求以無國籍人身分歸化入籍。九月十二日內政大臣答覆說，科倫當局的拒絕是合法的，國籍一經拋棄，立即生效，普魯士不歡迎拋棄國籍的人再申請入籍。

(二) 馬克思對拉薩爾的不誠實：一八四八年初，當法、奧、德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拉薩爾陷入哈茨費爾特夫人官司中，根本無暇參加。當年二月他甚而因為涉嫌教唆偷竊哈茨費爾特伯爵情婦珠寶匣事件被捕入獄，一直拘留到同年八月十一日被宣判無罪後，才參加他被拘留在杜塞爾多夫市(Dusseldorf)的革命活動。這些活動是屬於所謂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因革命活動而在科倫的馬克思建立聯繫。馬克思很快把在杜塞爾多夫市表現積極優異的拉薩爾，視為「革命戰友」。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馬克思由科倫寫信給在杜塞爾多夫的拉薩爾，鼓勵革命，並請求借貸，信中稱：

親愛的拉薩爾：

請在你們的民主君主政體俱樂部裏，通過如下決議：

- (1) 普遍拒絕納稅；
- (2) 派遣志願軍去柏林；
- (3) 捐款給柏林民主主義者中央委員會

第一國際前後馬克思對拉薩爾派的爭論

受萊茵省民主委員會的委託。卡·馬克思

私事：如果你能給我寄錢來，無論是二百塔勒，或者借貸單據，那我將非常感激你。請把它寄到賓西利安街七號我妻子處。我今天接到傳票，人們都認為，我明天將被逮捕。(註二八)

拉薩爾曾接濟過馬克思，拉薩爾也受馬克思「共產黨宣言」影響，認為馬克思是他的老師。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可說是兩人交往的「蜜月期」。幾十年後恩格斯說馬克思「從一開始就對拉薩爾抱著強烈反感」，馬克思傳作者梅林說，「恩格斯記錯了」。(註二九)

從「新萊茵報」上馬克思對拉薩爾的聲援，可以證明恩格斯的確是「記錯了」。恩格斯並且說，馬克思故意盡可能不去注意拉薩爾為哈茨費爾特夫人所進行的訴訟，因為他不願意在這樣的事情上表示和拉薩爾有任何共同之處。這一點梅林說恩格斯也「記錯了」，因為「馬克思在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困難的時候，也曾幫過她的忙，從自己為數不多的錢裏拿出一部分來借給他」。(註三〇)但拉薩爾把馬克思向他借錢的事張揚出去，使馬克思極為難堪。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馬克思從巴黎寫信給他僅次於恩格斯的好友弗萊里格拉特 (Ferdinand Freilgrath 1810-1876) 說：

親愛的弗萊里格拉特：

我向你承認，拉薩爾的行為使我非常吃驚。我個人曾向他求援，因為我也曾把錢借給伯爵夫人。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拉薩爾對我是不錯的，所以我根本沒有料到會這樣使我難堪。相反地，我曾經請他千萬不能張揚出去。我寧願過最貧困的生活，也不願公開求乞。為此我給他寫過信。

這件事真叫我說不出的生氣。(註三一)

拉薩爾曾為此事寫信向馬克思解釋，據說那封信「已驅散了馬克思心中的不快」。兩人情感的惡化，拉薩爾的有欠厚道，應是原因之一。

但馬克思對拉薩爾不真誠，表面和內心看法不一致，或可作為恩格斯所說「從一開始就抱著強烈反感」的註解。馬克思一生對恩格斯和弗萊里格拉特，是少數可以無話不談的朋友，他和拉薩爾相交十來年後，從馬克思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從倫

「敦寄給恩格斯的信，可看出他倆對拉薩爾是多麼表裏不一致。馬克思對拉薩爾諷刺辱罵之外，告訴恩格斯對拉薩爾「只要巧妙對付他，這個人是完全可以屬於我們的。」他說：

我給拉薩爾去信以後，小猶太布勞恩（拉薩爾）沒有給我寫過一封信，而且已過了四個多星期。一方面他一直忙於出版自己不朽的「激動人心的」著作「濟金島」，一方面我的貨幣分析問接給他當頭一棒，打得他有點暈頭轉向。不過，小猶太寫的東西雖然拙劣（甚至他的赫克利特），也比民主派能夠吹噓的一切作品都要高明。……

因此，無論他要出什麼「激動人心的」花樣，只要巧妙的對付他，這個人是完全可以屬於我們的。（註三二）

拉薩爾人格上也的確有其雙重性。一八四五年剛二十歲大學畢業的他，就曾贏得大他近三十歲譽滿歐洲的名詩人海涅的極度推崇。恩格斯在拉薩爾死後二十三年年還說：「拉薩爾對他（海涅）可能是很有用處的。拉薩爾以自己的精力、果敢和老練，贏得了海涅的敬佩，在當時以及現在的大多數年輕德國人中，是打著燈籠也難找到的。」（註三三）

一八四六年二、三月間，海涅給德國名作家恩賽寫信推薦拉薩爾說：「這位年輕人具有卓越的才能，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具有這樣淵博的學識、廣泛的知識和銳敏的智慧的青年人。」他給拉薩爾的信則恭維說：「同你相比，我只不過是一只小小的蒼蠅。」（註三四）但五年之後，海涅對拉薩爾卻恨之入骨。海涅說拉薩爾「迅速的向壞的方向發展，成了最可怕的惡魔中的一個。他現在什麼都做得出來，甚至會殺人、放火和盜竊。」（註三五）

雖然恩格斯一直不喜歡拉薩爾，卻極為稱讚他的才華。評論五十年代德國「優秀分子」，說「拉薩爾比他們所有的人都能幹得多」，並說「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黨性和抱負。」（註三六）另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拉薩爾自始就抱著排斥態度。辦「新萊茵報」時期表面上看馬克思是拉薩爾政治活動支持者，內心裏馬、恩兩人對拉薩爾十分討厭。一八八〇年五月四日恩格斯給馬克思二女婿拉法格（Paul Lafargue 1842-1911）信說：

拉薩爾從來沒有當過「新萊茵報」的編輯，他甚至從來沒有給該報撰過稿。除了只在一期上登過一篇小品文以外，而這篇小品文也由編輯全部改過了。拉薩爾這一時期只是在辦理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同她丈夫的離婚案件，即使他向我們表示過願意擔任編輯，我們也會斷然拒絕對一個從事這種聲名狼藉的案件而勢必從頭到腳污穢不堪的人合作。（註三七）

(三) 馬克思對拉薩爾的政治聲援：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拉薩爾向杜塞爾多夫市羣衆演說，並代表該市「民主主義者區域委員會」，擬一分致柏林議會的建議書。書中說：「消極抵抗已經到了盡頭，我們懇求國民議會，請您號召人們拿起武器，請您號召人們履行義務。」(註三八)杜塞爾多夫市市民自衛團指揮官是康塔多(Lorenz Cantado)，命令市民日夜製造槍砲，準備「武裝起義」。拉薩爾是他的助手，所以普魯士政府下令把拉薩爾和康塔多都加以逮捕，等候審判。康塔多被關至次年三月，宣告無罪釋放。拉薩爾則被羈押至同年五月三日，才公開審理。

拉薩爾被捕之後，「新萊茵報」曾有由馬克思執筆的一系列專論，攻擊普魯士當局逮捕羈押的不當。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報導，「拉薩爾被關在杜塞爾多夫監獄已經十一個星期，才結束了一些簡單的、事實的偵察。」「這算什麼審前羈押啊！」接著報導獄吏們對拉薩爾的不禮貌和「用打耳光、關禁閉和體罰來威脅。」馬克思說：「拉薩爾一案對我們來說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關係到一位同胞，一位黨的朋友的自由和權利，而且涉及一個問題，即陪審法庭處理政治犯的特權。」(註三九)

普魯士政府並未理會「新萊茵報」的吶喊鼓噪，卻依照當時法律可以對被捕者先給審判前三個月羈押，再延長三個月羈押方式，關押六個月(差二十天)，然後於五月三日宣告無罪。但並未釋放，「陪審法庭」宣告無罪，「違警法庭」立刻把拉薩爾重新加以審訊，說他半年前在杜塞爾多夫市的煽動性演說，「號召羣衆以暴力反抗官員」，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

同一案件由兩個法庭接連作兩個不同的判罪，馬克思主義者認爲這是「歐洲司法史上的少見」。對拉薩爾一直沒有半點好評的恩格斯，也在五月二日、三日的「新萊茵報」上，連續以兩篇專欄，爲拉薩爾辯護聲援。可能那時普魯士還沒有禁止干涉司法審判的規定，所以恩格斯敢於在審判前一兩天對法院大肆攻訐。恩格斯說：

然而給拉薩爾判罪，正是杜塞爾多夫當局、內閣以至大權奸們所渴望的事情。對拉薩爾的怒火，「直到國王的寶座前都沒有熄滅」。結果是：「檢察院停止對康塔多爾起訴，予以釋放。拉薩爾、韋耶爾斯則繼續管押，聽候陪審法庭審訊。

「要知道，康塔多爾和拉薩爾是以同一罪名被控的，唯一的區別是拉薩爾在約伊斯發表了一次演說。(註四〇)

「新萊茵報」自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在科倫創刊，就以反政府立場，自詡爲「革命機關報」。拉薩爾一八四八年十一月至次年底，先被羈押半年，再被判刑半年，可能是「新萊茵報」的受害人。一則拉薩爾以與該報爲同路人姿態出現，所以有後來

恩格斯說拉薩爾從來就沒有當過該報編輯的聲明。再則普魯士政府一向以強硬手段對付歧異分子，「新萊茵報」對拉薩爾被關押的呼號營救，正好發生相反效果，成爲羈押和判刑的良好理由。

三、拉薩爾的著述與其論赫拉克利特哲學

(一) 拉薩爾的著述與事業顛峰：拉薩爾死於一八六四年八月，真正使他名滿歐洲並成爲馬克思後來大加撻伐的，是他死前兩年即一八六二至一八六四年發表的許多著作，和極爲活躍而由他領導的工人運動。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四年代表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與其夫婿的離婚官司，爭得女方勝訴和取得共有財產部分的大量金錢賠償，已使他成爲家喻戶曉人物。但那被認爲是「骯髒的」浪得虛名。他生命中最後兩年的貢獻，才被擁護和反對者所共同肯定。

這兩年他的著作不下二十種，其中二至三種可以稱之爲「書」。這些著作依時序排列如下：(註四一)

一八六二年：

舒米德文學史論 (Herr Julian Schmidt, the Historian Literature)

憲法論 (Constitutional Theory)

工人綱領 (The Workmen's Programme)：一篇對工人的演說，廣受讚譽，被認爲與「共產黨宣言」相媲美。

非希德哲學 (Fichte's Philosophy)

科學與工人階級 (Science and the Working Classes)：爲法院控告「工人綱領」煽動叛亂的辯護詞。

罪惡的拖延：法院第二審 (Criminal Trail, the Court of Second Instance)

一八六三年：

間接稅 (Indirect Taxation)

強權與公理 (Might and Right)

罪惡的拖延：法院第三審 (Criminal Trial, the Court of Third Instance)

復公開信 (Open Letter of Reply)

勞動階級問題 (The Working-Class Problem)

工人手冊 (The Workmen's Handbook)

喜慶擁擠的法蘭克福代表會 (The Festivals, the Press, the Frankfurt Deputies' Meeting)

告柏林工人 (To the Workingmen of Berlin)

一八六四年：

資本與勞動 (Capital and Labour)

控告叛國罪 (Prosecution for High Treason)

答某吹毛求疵者 (Reply to a Criticism)

朗斯多夫演講詞 (Speech at Rousdorf)

論「六二七」罪惡審判 (Criminal Trial on June 27)

以上這些著作以「復公開信」引起的爭論最多，但都不及一八五五年他出版那本「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Philosophy of Heraclitus the Obscure) 學術味重。與哈茨費爾特伯爵官司接近尾聲時，他才又拾起擱置已久的赫拉克利特研究，以約兩年時間完成這本超過八百頁的兩卷集。這本書使人發現，拉薩爾原先純黑格爾式的形而上學看法，已被赫拉克利特許多歷史觀點取代。他之所以對赫拉克利特發生興趣，因為黑格爾變動不居的辯證哲學史觀，正適合這個青年黑格爾派去研究二千年前古希臘「萬物永恆運動」的赫拉克利特學說。(註四)馬克思於一八五八年病中赴曼徹斯特恩格斯家中休養時，讀了拉薩爾這本書。因為馬克思一八四一年博士論文是「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與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區別」，同樣是研究古希臘哲學，所以寫信給拉薩爾，一則請拉薩爾關照書商對他因病耽擱出版問題的諒解，再則對拉氏「有工夫把希臘語文學掌握到這樣的程度」，表示推崇。馬克思說：

我在病中細讀了你的「赫拉克利特」，並且發現，根據保存下來的零星殘篇而恢復起來的體系作得很高明。而機智的論戰也使我感到不小興趣。我認為，可以在不損害內容的條件下寫得更緊湊一些。其次，我很想在這本書中找到你對黑格爾辯證法採取批判態度的證明。最後，在某些細節上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例如在理解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方面。此外，我不理解，你在百忙之中怎麼有工夫把希臘語文學掌握到這樣的程度。（註四三）

赫拉克利特生死年不詳，鼎盛年約在公元前五〇四至五〇一年間，為第六十九屆奧林匹克賽會時期。他被稱為「暗昧者」（The Obscure），在他留下的百餘則「自然論」（On Nature）殘篇裏，「不止一次，或預示了近代學說，或明白規定了近代學說。」（註四四）赫氏把一切物體，看做同一原質的變遷。這原質他有時稱之為火（fire），有時稱之為熱氣（warm breath）。「一切存在的東西全是變遷的火，而且終必要變成火。」（註四五）因而，整個宇宙和一切物體後來要在一場總的焚燒中重新為火所燒燬。

赫拉克利特殘篇，有許多為學者引述的見解：

「赫拉克利特在某個地方說：一切皆流，無物常住；他把萬物比作一道流川，斷言我們不能兩次走下同一條河。」——柏拉圖：「克拉底洛」篇。

「赫拉克利特否認宇宙間是靜止和常住不變的，因為這種狀態只有包含著死亡。他認為萬物都在運動，永恆的事物永恆的運動著，暫時的事物暫時的運動著。」——艾修斯，第一卷第二十三章。

「任何人都不能設想同一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像有些人認為赫拉克利特主張的那樣。」——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四卷，第三章。（註四六）

赫拉克利特自己說法，更見新穎：

「太陽每天都是新的。」

「自然也追求對立的東西，他是從對立的東西產生和諧，不是從相同的東西產生和諧。結合物既是整個的，又不是整個的；既是協調的，又不是協調的；從一切產生一，從一產生一切。」

「神和人都崇敬戰爭中陣亡的人。」

「這個世界對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創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創造的。它過去、現在和未來，永遠是一團永恆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燒，在一定的分寸上熄滅。」

「火的轉化是：首先成爲海，海的一半成爲土，另一半成爲旋風。土化爲海，並且遵照著以前海化爲土時所遵照的『邏各斯』」。

「撲滅放肆急於撲滅火災。」

「人民應該爲法律而戰鬥，就像爲自己的城垣戰鬥一樣。」

「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所以它分散又團聚，接近又分離。我們既踏進又不踏進同樣的河流，我們既存在又不存在。」（註四七）

拉薩爾是很讚許赫拉克利特的。他說：「赫拉克利特不是冷漠的斯多噶派，儘管他是以深奧的獨白討論倫理政治問題，形式相似斯多噶派，本性則烈如風暴。」受黑格爾和赫拉克利特辯證觀點影響，所有拉薩爾著述都反對孤立看待問題的看法，認爲哲學史不該再被視爲知識的孤立部門，而是和藝術、憲法、社會生活史的發展都息息相關而互爲影響的。（註四八）

拉薩爾認爲，赫拉克利特的道德體系 (ethical system) 是信從大自然 (Surrender to the University)，他由此一觀點，把希臘古哲人和黑格爾兩者的政治哲學理念，加以統一。他說：「黑格爾哲學把法律視爲大自然存在意志的具體實現，但並不拘限於小的種類數目。同樣的，赫拉克利特的大自然觀也是離開實證物體的種屬從總體著眼。」（註四九）赫拉克利特的主張不只與黑格爾有相同處，對拉薩爾青年時期思想影響尤深。拉薩爾自年輕時便認爲，理想國家就是能實現道德、正義、理性的國家。他熱衷於此一理念，他相信國家的必然使命，不僅是人民安全的保障力量，而且是伸張正義，發展文化的積極推動者。這種看法，可以追溯自他的「學術的、科學的鑽研成果——赫拉克利特」。他早年的另一大著「權利獲得的程序」(The System of Acquired Rights)，即以此一看法爲主。一八六二至六四年間，把此思想充塞於他的政治經濟小冊子著述內，使他成爲普魯士最著名而令人敬服的雄辯家與作者。（註五〇）

但這並不是說拉薩爾與赫拉克利特思想上沒有不同。拉薩爾崇拜知識，反對羣衆意見和公共輿論，主張全民投票決定政治問題，是知識貴族與社會民主思想的合一。赫氏則不可能有「全民投票」(universal suffrage)想法，這方面拉薩爾是先驅者。拉薩爾很推崇赫拉克利特認爲「衆人皆醉我獨醒」的看法。他的著述中多處讚揚赫拉克利特所一再堅持的：「人類是愚蠢的，只有一個人有智慧，其他人的行爲都在睡夢中。」依拉薩爾看，赫氏的真意是，只有他一個人有智慧，他的同胞們「都該吊死，因爲羣衆只是像牲畜樣餵活著。」拉薩爾雖然不曾如此說，卻可能如此想。因爲他也認爲自己智慧超過全民，人民是愚蠢的。拉薩爾是英雄崇拜者。(註五一)

赫拉克利特和拉薩爾性格上被認爲另一相同之點，是都渴望自己獲得令譽和榮耀。赫氏是被逐出的希臘貴族，認爲榮譽高於一切，要博得榮譽，「必須同試探的魔鬼携手」。(註五二)拉薩爾更熱衷榮譽，爲了躋身學者之林，努力著述。「赫拉克利特哲學」一書出版不久，就被接納爲柏林哲學學會會員，爲當時士林所讚許。這一點成爲後來馬克思和共產黨人譏諷惡評的「劣點」之一，努力著述也成罪過，看起來是不公平的。

四、馬克思對拉薩爾修正調和主張的抨擊

(一) 拉薩爾生前馬克思對他的譏評敷衍：一八五八到一八六三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拉薩爾間都有大量通信。馬、恩間通信之多，早有專卷。馬、拉間通信，從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起，到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七日止，兩人斷繼交往信件十五年。從馬克思對拉薩爾信看，兩人感情融洽，馬克思信中對拉尤多讚譽感激之詞。因爲馬克思經常要求拉薩爾金錢接濟，拉薩爾也盡力相助。但從馬克思、恩格斯間通信看，拉薩爾是他倆敷衍詆譏的共同敵人。信中對拉薩爾的譏評愚弄，使人感到那種對朋友表裏不一，「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作法，實在不是學者所應爲。尤其不該的，是兩人一直把拉薩爾信交互寄遞傳閱，批評唾罵。

馬恩全集中所載馬克思一八四八年十一月給拉薩爾的第一封信，要求拉薩爾參加的「民主君主政體俱樂部」通過決議：「普遍拒絕納稅」、「派志願軍去柏林」，已見前述。以後再見通信，是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相隔已近十年。後一封信

是馬克思致拉薩爾贈「赫拉克利特」一書的謝函，馬克思說：「謝謝你的『赫拉克利特』，在古代哲學家家中，我認爲他僅次於亞里士多德。較晚的哲學家伊壁鳩魯、斯多噶派和懷疑論者，我曾專門研究過。但與其說是出於哲學興趣，不如說是出於政治興趣。」（註五三）

這以後兩人通信頻繁，恩格斯和拉薩爾間也有少數信來往。最奇怪的是馬、恩兩人分別拜託拉薩爾替他們辦事，拉薩爾如囑照辦了，兩人間通信卻對拉薩爾近乎誹謗的指責。比較一下馬、恩兩人在國外託請在德國的拉薩爾替他們出版書的情形，可見梗概：

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五八、二、二二。

自然，我給了他（拉薩爾）回信，爲的是要他仔細打聽一下柏林的出版商。我打算把稿件（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經濟學手稿）分册出版，因爲我沒有時間也沒有錢來從容地把它全部寫完。分册出版也許有損於形式，但至少有利於推廣，而且便於找出版商。（註五四）

馬克思同一天給拉薩爾的信，十分客氣。「如果我能把全部著作不定期分册出版，那對我來說是十分合適的了。能不能在柏林找到一個出版商，如果您能打聽一下，我當然十分感激。」（註五五）後來書商爲印拉薩爾的「濟金根」，使馬克思此書印刷稍有延擱，馬克思致函恩格斯抱怨：「十一天中，這個畜牲（出版商）又什麼也沒有寄來。你知道誰在給我搗鬼？不是別人，正是拉薩爾。」因爲拉薩爾還要印他另一本小冊子「義大利戰爭和普魯士的任務」。書信間馬克思一直稱拉薩爾是「蠢貨」。（註五六）

另一件事是恩格斯託拉薩爾的，一八五九年三月十四日恩格斯致拉薩爾請他交涉出版小冊子並以匿名發表，照辦之後，馬、恩間書信卻對拉薩爾盡情非難。恩格斯致拉薩爾的請求協助函，也是有關出版書的事：

首先請允許我感謝您在同敦克爾（出版商）交涉中所給予的幫助。您的幫助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果，使我有可能將近十年來第一次又出現在德國讀者面前。馬克思和我都認爲，小冊子由於它的專門性質，最好先匿名出版。（註五七）

拉薩爾切實遵辦，爲了顧及恩格斯名字曝光或被檢查機關猜出作者是誰，還特別分六天寄給恩格斯校稿，這卻引起馬克思

的憤怒。一八五九年他給恩格斯信：

關於你的小冊子，拉薩爾昨天來信說，爲了不使某些人猜出作者是誰，將要按印刷品分開連續寄六天。你見過這樣愚蠢的舉動嗎？關於小冊子本身，拉薩爾寫道：「小冊子所發揮的戰略認識的尖銳性和嚴整性，確實令人欽佩。」「認識的尖銳性」，應該看成是筆誤。（註五八）

可見他們兩人自始就把拉薩爾當「外人」和「敵人」看，處處吹毛求疵。馬克思信中把拉薩爾叫「蠢貨」、「蠢驢」，不勝舉述。反過來看，拉薩爾一直把馬克思當老師尊敬，自稱是馬克思學生。拉薩爾把他的「赫拉克利特哲學」送給馬克思，馬克思曾一再覆函致謝，並加稱讚，但在馬、恩問書信，卻極盡對拉薩爾此書的諷刺挖苦。再舉數段：

馬克思致恩格斯，一九五七、五、八。

五英鎊收到了，附上拉薩爾的信，給魯普士看了後，請於下星期寄還我。我應該怎樣對待這個傢伙？要不要回信？這個傢伙拼命追求榮譽，無緣無故寫了七十五印張論述希臘哲學，他這種可笑的虛榮心會使您愛笑。（註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一九五七、五、一一。

這裏附還拉薩爾的信，完全是個庸俗的猶太人。他拼湊寫成的不會是什麼好作品，就是這篇他認爲「將激動人心」並這樣保密的東西，也會是這樣。對這個傢伙沒有什麼可指望的，不過難於找出的理由直接同他決裂。（註六〇）

馬克思傳作者和自認爲馬克思派的梅林，說「馬克思對拉薩爾態度，乃是他一生中一個最複雜的心理問題」，（註六一）誠然。這說法所謂正統馬克思派並不承認，反而說這是梅林的「偏見」。（註六二）

（二）政治方面的爭論：德國統一和國家體制問題。五十、六十年代馬克思對拉薩爾間的譏評，大致可歸納爲三類。這些爭論在拉氏生前多用通信方式進行，範圍涉及政治（國家統一）、哲學、經濟等問題。拉薩爾死後，馬克思攻訐尤多。

德國統一問題，在十九世紀五十、六十年代，是日耳曼人甚至全歐洲關心的大事，德國的工人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較歐洲其他國家也遠爲進步。對馬克思最不利的一點，是馬克思的著作和六十年代第一國際成立後，對德國都幾乎沒有關係，馬克思對德國社會民主運動，影響也極爲微小。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風潮過後，政治不安蟄伏，直至一九五九年威廉王子（後來的

威廉第一)攝政宣佈「新時代」(New Era)開始,反對勢力受到較大容忍,自由資產階級被允許於一八六一年組織進步黨,要求成立國會,工人運動以「資產階級尾巴」形勢開始活動。一八六二年十月,國會拒絕通過新受命出任總理的俾斯麥所提軍費預算,俾斯麥宣佈「以鐵與血統一德國」(To unify Germany by blood and iron),展開以後四年不受國會限制的徵稅行動。是德國的「由上而下革命」。(註六三)

一八四八年「革命熱」過後,馬克思遠走英倫,退入書房。拉薩爾官司纏身,但對國內政治大勢從不忽視。他看清楚一八四八年式的「由下而上革命」,已無可能,統一德國的唯一道路,是用普魯士武力作「由上而下革命」。於是在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萊比錫成立「全德工人聯合會」。拉薩爾甚而秘密與俾斯麥通信,保證支持政府的「鐵血統一國家」政策。(註六四)不論拉薩爾的目的和手段是否適當,但拉薩爾首先喚起工人階級參予運動,並成爲第一個工人社會主義黨的組成者,則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這一點連馬克思也不得不於拉薩爾死四年後寫給施韋澤的信說:「在德國工人運動沉寂十五年之後,拉薩爾又喚醒了這個運動,這是他的不朽功績。」不過馬克思認爲,「拉薩爾的聯合會,是在一個反動時期成立的。他把一個小小的出發點,當作自己鼓動的中心點:以國家幫助反對自助。」(註六五)

正由於「由上而下革命」的統一德國觀念,拉薩爾在「義大利戰爭和普魯士任務」一書中,大力鼓吹普魯士王朝統一德國無可旁貸的神聖使命,因而也絕對擁護普魯士的君主立憲政體。受黑格爾哲學影響,拉薩爾認爲國家超階級而存在,國家是倫理意志的統一體,君主則把倫理的國家意志,通過血統繼承而確定爲最高的、最牢固的特權。王權就是這樣被推動著去實現國家的倫理意志,並反對與此目的相反的社會勢力。基於此一史實及擁君觀點,俾斯麥在一八七八年帝國會議裏報告說:「應拉薩爾之請,曾經和他談過幾次話,但不是『談判』,理由很簡單,因爲拉薩爾不代表任何政治實力,沒有任何實際貢獻。不論如何,他是真正的愛國知識分子。」(註六六)

遠在國外的馬克思,一貫思想是「由下而上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對拉薩爾想法自始反對。從歷史現實回顧,當時馬克思想法是絕對不合實際的,但馬克思、恩格斯決不認錯,反而一口肯定說「拉薩爾事實上背叛了黨,他和俾斯麥訂立了契約,自然並沒有得到任何保證。」(註六七)以及「拉薩爾同俾斯麥的關係,比我們過去懷疑的,還要密切得多,愚蠢的拉薩爾沒

有從俾斯麥那裏獲得任何保證。」(註六八)

(三) 哲學觀點問題：拉薩爾是多產作家，一八五七年出版他的赫拉克利特哲學已見前述，馬克思諷嘲之後，仍給恩格斯信說，他適當淺釋了黑格爾歷史哲學的重要部分。一八五九年出版歷史戲劇「濟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主旨討論十六世紀騎士們領導聯盟所形成的德國改革運動，其悲慘結局則用以影射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敗，充滿愛國情操與日耳曼使命感。一八六〇年寫「費希特哲學與德意志民族精神」，一八六一年出版他的最重要作品「獲得權利的程序」，包括哲學、歷史、政治學觀點，使他在學術世界廣被接納。費希特哲學裏他闡揚「意識決定存在」的唯心主義觀念，說「自我或純粹思維成了真正自在之物」，歷史由英雄和天才推動，德意志民族負有推動歷史使命，會不斷有不世的天才英雄產生，這些觀點和馬克思學說都是正好相反的。至於權利獲得程序，他是從德國繼承羅馬法律的觀點探討。拉薩爾提出的問題是：權利在什麼環境之下才會獲得並保證擁有它？

這一問題的實質論爭是：究竟力量先於法而存在，還是法先於力量，有了法的規定才有力量？拉薩爾的結論是力量先於法而存在，法建立在力量之上。他說權利固由於個人慎重合法行為而獲得，但法律許給的權利之所以能夠生效，因為法理先已獲得全民的認知。(註六九)

拉薩爾這一些說法，頗近於馬克思堅持的「存在決定思維」說法。早在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就在「柏林危機」一文內說：「國王有權向國民議會挑戰，國民議會也有權向國王挑戰。誰的力量大，誰的權利就大，力量要受到鬥爭的考驗。……沒有力量」的方面只是空談權利。」(註七〇)所以這說法是與馬克思一致的。這說法也令俾斯麥喜歡，「鐵與血」是力量的具體化。這說法當然也不是拉薩爾或馬克思首創，毛澤東「槍桿子下面出政權、出一切」說法，也不一定源自他們，因為是常識事實問題。

在哲學觀點上除「權利基於力量」這點馬克思與拉薩爾看法相近外，其餘沒有相同處。拉薩爾一直是黑格爾青年派和大日耳曼民族主義者，都是馬克思大力抨擊的對象。拉薩爾學說受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一定影響，但完全排除宣言內「人類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的論斷。拉薩爾認為：「所謂歷史，就是同自然的鬥爭，就是同貧困、愚昧、窮苦、軟弱無力以及人類在歷史初期遭受的種種不自由所進行的鬥爭。逐漸克服軟弱無力，就是歷史表現的自由的发展。」(註七一)

這一前提下，拉薩爾不把國家當成必然消亡的剝削壓迫機器，而認為它是超階級的，實現人類向自由發展的道德整體，和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以及其他所有學說都完全相反，這就是馬克思所絕對不能容忍的重點所在。馬克思罵他是「不可救藥的唯心主義者」，認為他和黑格爾一樣，是「頭足倒置的」哲學。因而拉薩爾排除階級鬥爭，主張調和。他說「工人等級同全類是一致的，它的事業是全人類的事業，它的自由是全人類的自由。」他呼籲「以工人的等級思想作為社會的統治原則，這是消除社會團體之間一切對立的呼聲，是團結的、仁愛的呼聲。」（註七二）這些修正調和說法，統統成為馬克思對拉薩爾不諒解的因素。

拉薩爾在哲學上另一點對社會主義思想的貢獻，且為馬克思所深惡痛絕的，是在他的「權利獲得程序」內，綜合羅馬法觀點和黑格爾學說精神，否定「社會主義為人類歷史必然歸趨」的宿命論說法。他堅信，人類有權利依照自己志願，決定自己前途，此之謂「人類精神」(Spirit of People)。「因而，在制定法律，走向法治的路上，並沒有任何障礙能夠阻止法律的形成。人類將來對真正權利的唯一正確試探方式，是把它建基在公眾良心的判斷上。」（註七三）拉薩爾依照此一觀點，也同西方一般社會主義思想者一樣，反對給任何階級以統治人類命運的必然特權，它認為歷史的流向決定於人類公眾的意願，這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共同說法，正是馬克思所批斥的唯心主義。

（四）經濟問題的爭論：真正使拉薩爾成為社會主義學者，是他的政治經濟思想。政治經濟本難分開，拉薩爾政治思想著重在前述擁君愛國及普魯士統一德國等論點上，經濟思想則希望從政治力量入手，經過全民普選，用國會力量改善工人際遇，用國家力量舉辦合作社。他的政治思想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實現他的經濟理想。

拉薩爾政治經濟理想的重點，是德國工人階級必須有全國性組織，通過「直接普選」(universal direct suffrage)，提出工人階級認為最迫切的要求，予以實現。他把普選看成第一要務，相信沒有普選，工人的任何想法都無從落實，任何經濟地位都無法改進。但要普選必須賦予工人選舉權，有了普選權，工人們自然會選出代表運用政權，使國家實現他們的要求。那時候國家會成為拉薩爾所經常形容的「實現全民幸福的立法工具」(it was legitimate at all—the instrument for the furtherance of the general good of the entire people)。（註七四）

「工資鐵律」(the iron law of wages) 是拉薩爾認為必須用政治力量解決的問題，解決的方式是通過普選立法改善工人際遇，另一方面用工會監督經營和國家協助辦理生產合作社方式，消除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關於「工資鐵律」的形成，拉薩爾看法與馬克思和李嘉圖 (David Ricardo 1772-1823) 相近，都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工資不論在何處從事何種行業，都是向最低生存線 (subsistence level) 上掙扎。」他們也都承認，「生存線不是不變的，它依某一社會某一特殊時期共同的最低生活水準而變動。」(註七五) 他們也認為，「生存線」的變動情形，長期依生產條件與社會組織變動而與維持工人及其家庭生理生存最低標準相適應。拉薩爾工資理論，深受馬爾薩斯 (Robert T. Malthus 1766-1834) 人口論影響，他的普選立法解決方法，則與法國激進社會主義者「國家工場說」的路易·勃朗 (Louis Blanc 1811-1882)，頗為接近。

路易·勃朗被馬克思派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歷史學家，採用與資產階級妥協的立場。」他在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風潮前的十年裏，大力鼓吹普選作為建立「工人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labour) 的基礎。但勃朗普選目的與拉薩爾不同，勃朗希望工人階級贏得選舉後，強迫政府建立普遍的「國家工場」(national workshops)，不由國家經營一律交由工人管理，成為「工人自治社團」(self-governing workers' corporations)，藉此政治經濟合一的「工人組織」，一方面保障工人「工作權」(right to work)，一方面使工人得以充分享有他們的勞動成果。

所以，拉薩爾與勃朗解決人工工資問題的方式顯然大不相同。拉薩爾希望藉工會監督經營，在國家協助下建立生產合作社，減除中間剝削，提高工人待遇，近乎傅利葉派 (Fourierists) 思想。勃朗則公然反對傅利葉派想法，認為即使以志願合作方式在政府協助下促使工人收入提高，生活改善，也只限於小團體少數工人獲得些許利益，無法促成整個資本主義籠罩下剝削制度的廢棄。勃朗反對傅利葉派，與拉薩爾思想也迥不相同。拉薩爾對於土地和資本的私有財產制度，並未觸及。(註七六)

因而馬克思對拉薩爾思想的反對是多方面的。像拉薩爾一樣，馬克思也想利用工會建立組織，第一國際的建立就是如此。但馬克思目的是推翻現制度，消亡國家，不是要國家協助建立合作社或任何組織。至於馬克思的工資論，反對拉薩爾、馬爾薩斯和勃朗等所有人的解決方法，認為廢除私有財產制度，消滅資本主義，實行共產主義，「工資鐵律」自然消失，問題自然解決。

五、馬克思對拉薩爾死後批判

(一) 拉薩爾死亡初期馬克思的態度：一八六四年九月「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建立，是馬克思回到書房潛心研究十二年後，另一次全身投入政治運動的開始。這個組織建立於拉薩爾死後一個月，在拉薩爾生前最後兩年(一八六二至六四)從事工人運動最活躍，著述最繁多的時期，馬克思對他沒有嚴重的抨擊。拉薩爾死後馬克思卻對他作「死無對證」的不斷抨擊，這是學者一直認為馬克思有欠厚道，不夠公平的地方。(註七七)

拉薩爾於八月三十日決鬥，腹部中彈，次日死亡，馬克思於九月二日立即展開他與恩格斯間對拉薩爾的書信討論。九月四日恩格斯給馬克思信說：

你的電報昨日收到，可以想像這消息使我多麼震撼。且不論拉薩爾在品性上、著作上、學術上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但在政治上無疑是德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對我們來說，目前他是一個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將來是一個相當肯定的敵人。……他以唐璜自詡，最後讓人家殺害自己。這只有拉薩爾才幹得出來，因為只有他才具有那種輕浮和感傷、猶太人習氣和騎士作風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的品性。(註七八)

三天後九月七日，馬克思回恩格斯函：

拉薩爾的不幸遭遇，使我在這些日子裏一直感到痛苦。他畢竟還是老一輩近衛軍中的一個，並且是我們敵人的敵人。而且事情來得太突然，使人難以相信。這樣一個愛吵愛鬧，非常好動，不願安寧的人，現在卻永遠無聲無息，不再言語了。至於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你說得完全對。(註七九)

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出生於一八〇五年，比一八二五年出生的拉薩爾正好大二十歲。一八四六年拉薩爾插手此一官司時，女方滿四十歲，史書上形容她仍是「艷光照人」。二十歲的拉薩爾和女方究竟是什麼關係？當時社會議論紛紛。反對者根本斥責兩人過於親密的交往甚而說拉薩爾承攬官司的不當，拉薩爾傳作者說兩人「關係不清楚」、「有若干戀愛」。伯爵夫人則稱拉薩爾為「孩子」和「我完全信任您」。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的態度。拉薩爾以「申張女權」和「幫助被壓迫者」姿態，和

當時最有權威的普魯士貴族在法律上纏鬥，十年官司終於勝訟，使拉薩爾成爲在歐洲仗義行俠的名人，更成爲歐洲婦女羨慕的對象。(註八〇)拉薩爾傳作者在一八七〇至一八八〇年間多次赴柏林，訪問認識或不認識拉薩爾的老婦人們，都「對這件家喻戶曉的事，仍給予由衷的讚美。」(註八一)至於拉薩爾與伯爵夫人間有沒有什麼「曖昧」關係，完全是他們個人自由，一個已被遺棄離婚，一個尚未結婚，不宜以「道德」問題妄加評論。但素以爲被壓迫者爭取權利自居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卻始終對拉薩爾打抱不平這件事，斥之爲「卑鄙無恥」。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馬克思致恩格斯函：

可是這個畜牲(拉薩爾)竟因此而大肆喧嚷！他竟炫耀自己的道德比李卜克內西高尚！正是這個傢伙爲了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而採取了最無恥的手段，並且和最無恥的人勾結在一起！難道這個畜牲已經忘記，當我想接受他加入同盟的時候，科倫中央委員會鑒於他的聲名不好而一致決議不許他加入？(註八二)

另一方面，馬克思給哈茨費爾特夫人也通過多次信，特別是拉薩爾死後，從信中看出馬克思對他們兩人的密切交往不但沒有任何不滿，而且倍加關懷。一八六四年九月十二日馬克思給哈茨費爾特夫人：

您知道，關於拉薩爾去世得完全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多麼驚訝和震動。他是我所十分器重的人之一。……請您相信，拉薩爾離開我們，沒有一個人不爲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而且我最爲您悲痛。我知道死者生前對您來說是多麼重要，他的死對您又是什麼含義。親愛的伯爵夫人，希望您以崇高而堅強的性格，經受任命運的這一打擊，並請永遠相信我對您的充分而由衷的忠誠。(註八三)

如果從馬克思給他另一好友庫格曼(Ludwig Kugelmann 1830-1902)醫生的信看，馬克思待人的表裏不一與雙重人格，會令人異常失望。不論如何，馬克思是近代大思想家、大學者。學術思想如何，有其自成邏輯的尊嚴，不論敵人或朋友，都可在理論上給予評論，但在人格上必須予以尊重。世人最難諒解馬克思的一點，是他對待朋友，一經情感破裂之後，立即作人身攻擊，髒話咒罵，並在不同朋友間用不同口吻論評同一個人，這不是學者應有的風範。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拉薩爾死不及半年，馬克思給庫格曼信說：

首先我想對你簡略地說明一下我對拉薩爾的態度。在他從事鼓動的時期，我們的關係已經斷絕了，這是：(1)由於他放

肆自我吹噓，甚至還把從我和其他人的著作裏無恥地剽竊去的東西，也拿來吹噓。(2)因為我譴責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為早在他開始進行鼓動以前，我在倫敦就向他詳細解釋和證明過：認為普魯士國家會實行直接的社會主義干涉，那是荒謬的。

對拉薩爾這樣一個裝腔作勢、愛好虛榮的人物來說（但是，他不是用市長等官職這樣的小恩小惠可以收買的），一個想法非常使他神往：為無產階級建立了直接功勳的拉薩爾！他對這種功勳的實現的經濟條件的確太無知，甚至不能批評的對待自己。(註八四)

(二) 第一國際時期馬克思對拉薩爾思想的圍堵：上面所列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對於拉薩爾非常神往的「為無產階級建立了直接功勳」，馬克思非常不以為然，認為拉薩爾「太無知」。但實際上拉薩爾在德國工運史上的確建立了直接功勳。這一點在第一國際初期，在德國本土代表馬克思活動的「馬克思、恩格斯朋友和戰友」威·李卜克內西，給第一國際的報告可以看出。威·李卜克內西 (Wilhelm Liebknecht 1826-1900) 於一八五〇年五月流亡倫敦十三年，是馬克思的密友、信徒和家中常客。他的自傳中有生動的與馬克思交往描述，他說：

在我流亡倫敦，忍饑挨餓，十分貧困的可怕的十三年中，只有很少幾天不去馬克思家。馬克思住在第恩街，恩格斯住在麥克斯菲爾德街，我住在這兩條街間的亭荷廣場教堂街。這裏是真正的流亡者居住區，離他倆住所都只有百步之遠。……恩格斯實行共產主義常常是這樣徹底，以致他不得不參加我們這批常去「當舖」者的行列。我們生活愈艱苦，也愈開心。(註八五)

一八六一年德國宣佈大赦政治犯，威·李卜克內西於一八六二年八月，偕馬克思命由倫敦回柏林當記者，主要目的之一是傳播「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思想。他和拉薩爾是朋友，他參加過拉薩爾赴「死亡約會——決鬥」前的告別宴會。他說：「那次告別宴是一八六四年拉薩爾在他那幢陳設考究的寓所裏舉行的。拉薩爾要離開柏林，而且不打算再回來，那是一次來客相當複雜的社交。」(註八六)

第一國際成立後，馬克思薦請委派李卜克內西為柏林區書記。一八六五年夏，李卜克內西被逐出柏林和普魯士，以後在萊比錫居住度過後半生的二十五年。拉薩爾的事業，建基於柏林和萊比錫，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卜克內西給第一國際

中央委員會一份長萬餘言的報告，名曰「德國工人階級運動報告」(Report on 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in Germany)，對於拉薩爾有相當多的敘述，他說：

拉薩爾走上時代舞臺，假如他不早死，一定會有更多貢獻。我無時間報告短文也不容許對拉薩爾作詳細描述，但他在德國工人階級運動中所完成的歷史角色，則是勿庸置疑。倫敦人應該更能做到。他具有更多的革命性格或者更好的革命氣質，他為卑怯的自由中產階級所厭惡。(註八七)

拉薩爾死後，俾斯麥在權力所及範圍內盡量實現拉薩爾思想，掌握工人階級。他允許作普選的仲介人(Go-betweens)，摧毀過激的自由中產階級運動。誘惑成果巨大，拉薩爾的朋友們都樂意接受。……去年(一八六四)十二月，許多拉薩爾朋友在柏林創辦「社會民主報」(Social-Demokrat)，立場是不論直接間接都支持政府，教導工人階級更明瞭自己崗位和職責。馬克思派朋友們斥之為人民叛徒。(註八八)

李卜克內西的報告對拉薩爾的評估，都是親歷目睹的第一手資料，可惜馬克思收到後竟置之不理，沒有在每週都舉行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提出宣讀。這是很少有的現象。因為德國、法國、瑞士、比利時各地都有第一國際派駐的地區書記，他們寄給總會的報告，照例都在會上宣讀，按說馬克思無權把李卜克內西的報告置之不理。李卜克內西的報告是用英文寫的，馬克思死後在他遺留的文件堆裏找到。(註八九)馬克思為什麼不宣讀？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給李卜克內西信解釋：

至於你的報告，我沒有向代表會議宣讀。因為關於我個人(你)在其中談得太多了。你在柏林的演說中，犯了些令人很不愉快的錯誤。這些錯誤只有你才能犯的，因為所涉及的事實只有你才知道。但這些事被你講錯了，而且有一半也被你遺忘了。(註九〇)

他不宣讀的真正原因，是他對威·李卜克內西這位忠實的「門徒和戰友」，突然感到不滿。這可能與李卜克內西回德國後和拉薩爾派走得太接近有關。早在同年八月五日，他便寫信給恩格斯，說「很久沒有給李卜克內西回信了，雖然他曾經寄給我各種便條，可是現在我想這樣做。」他繼續說：「另一方面，我的確對他很有氣憤，因為他在柏林拉薩爾派聯合會上說了些關於我的無稽之談，這可以在老淫婦(哈茨費爾特夫人)用幾個席林(幣名)出版的，關於貝克爾被開除聯合會的那本拙劣小冊子

裏看到。」(註九一)

有關馬克思派與拉薩爾派在第一國際中鬥爭情形，以後另有分析。總之，當第一國際建立之後，拉薩爾初死但徒眾由五千人繼續膨脹。德國工人運動本來附屬於資產階級之下由拉薩爾領導，此時逐漸分離出由威·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August Bebel 1840-1913)領導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cy Party)。「社會民主黨」雖然以與拉薩爾派相對的姿態出現，本質上仍超不出「資產階級民主框框」，這是深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不喜的。(註九二)

威·李卜克內西回德國後，把脚命回國組織的馬克思派向拉薩爾派靠攏，走向親政府的、妥協調和的修正主義，可能是馬克思一生最傷心失望的事件之一。李卜克內西既從拉薩爾「全德工人協會」分出另立組織，當然不再屬於拉薩爾派。但李卜克內西派以德國南部為主要活動基地，一八六五年德國南部資產階級成立「德國人民黨」(German Peoples' Party)，主張包括普魯士、奧地利的大德意志計畫，反對普魯士為主的領導權。李卜克內西與「人民黨」合作，「人民黨」則與拉薩爾派友善。所以李卜克內西與「資產階級民主派聯盟」，馬克思、恩格斯同認為「無法忍受」。(註九三)

這方面恩格斯於一八六九年七月六日致函馬克思：「不論如何，威·李卜克內西必須使他的組織與人民黨劃清界限」。(註九四)恩格斯次年初寫好「德國農民戰爭第二版序言」抨擊李卜克內西和人民黨，寄給馬克思看，馬克思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二日回恩格斯信說：「你的序言很好，進行雙重打擊，既打中李卜克內西和他的人民黨，又打中施韋澤和他那一夥壞蛋，太好啦！」(註九五)施韋澤是拉薩爾的事業繼承者。只因李卜克內西稍趨向民主改革的修正派，馬克思便不惜把好友打成拉薩爾派，予以全力反對，可見反修的堅決。

(三) 馬克思、恩格斯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拉薩爾派的鬥爭：從馬克思反拉薩爾調和妥協路線看，拉薩爾可說是修正主義的真正鼻祖。終馬克思一生對於批鬥拉薩爾思想，決不放鬆。一般所謂「修正主義」(Revisionism)，指一八九六年後至二十世紀初，由德國馬克思派柏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提出，對馬克思「歷史宿命論」(conception of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所作的修正批判。由柏恩斯坦看，資本主義危機是減少而非增加，中產階級是增加而非減少，民主政治國是決於民意而非少數武力統治階級，社會主義藉不斷修正演進的道德理想而實現，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災難，更非經濟決

定論。(註九〇)馬克思與拉薩爾為同時代人，當拉薩爾在德國甚至歐洲於五十、六十年代成爲家喻戶曉人物時，馬克思流亡英倫，實正處於「無名馬克思」(The Unknown Karl Marx)時期，談不到拉薩爾對馬克思的修正問題。(註九七)

但馬克思攻擊拉薩爾的路線，正是馬克思派以後攻擊各種宗派的修正主義者大致相同的路線，特別是攻擊拉薩爾的尊重國家政府以及全民普選的議會政治主張，這思想在一八七五年的「哥達綱領批判」裏，表現的尤其明確。

一八七五年五月，由威·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領導的「德國社會民主工人黨」愛森納赫派(南派)，終於和拉薩爾領導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北派)合併，成爲「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兩派於五月二十二至二十七日，開合併會議於德國南方小城哥達(Gotha)，開會前把兩派議定的共同綱領寄給馬克思和恩格斯，馬克思的名著「哥達綱領批判」，寫於四至五月間，恩格斯也於三月寫信給南派領導人倍倍爾，表示批判意見。兩人對綱領的批判意見大致相同，共同表達對拉薩爾派的批判，也就是對以後足足一百一十年左右共產黨人思想的絕對控制。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放鬆對「機會主義」的撻伐，允許「修正主義」抬頭，才能再對拉薩爾派當日學說，給予新的評估。

1. 恩格斯的批判意見：恩格斯三月底給倍倍爾的信，指出綱領中「我們的人在理論方面比拉薩爾的領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警覺方面卻差一百倍。」他說「誠實的人」又一次受到欺騙，被欺騙的主要有下列五點：(註九八)

A、不該說「對工人階級來說，其他一切階級都是反動的一幫。」這是接受了拉薩爾的響亮口號，歷史觀點卻是錯誤的。
B、拋棄了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

C、被拉薩爾「工資鐵律」強加在頭上，這是個陳腐不堪的經濟學說。該從馬克思「資本論」看問題。

D、剽竊來的「國家幫助」學說，毫無用處。

E、沒有談到通過工會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奪取政權。

2. 馬克思的批判意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之所以成爲共產世界的「不朽」文獻，因爲這個文件表達了馬克思晚期的成熟思想。馬克思告誡南派的領導人們：「一步實際行動要比一打綱領更重要」，「不能拿原則來做買賣」，以及「不要把拉薩爾的信條奉爲神聖」。馬克思最不能忍受的，是「綱領」以下幾段：

德國工人黨從這些原則出發，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來爭取國家自由和社會主義社會，廢除工資制度連同鐵的工資規律和任何形式的剝削，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爲了替社會問題的解決開闢道路，德國工人黨要求在勞動人民的民主監督下，依靠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無論在工業中或是在農業中，生產合作社必須普遍建立起來，以便從他們裏面產生出調節總勞動的社會主義組織。

通過國家來實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國民教育，實施普遍的義務教育，實施免費教育。（註九九）

馬克思認爲拉薩爾的工資論，只是抄襲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只能使貧困更普遍化。國家幫助建立合作社，也解決不了工人階級的貧困問題。至於「通過國家實施國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相反的，倒是國家需要從人民方面受到嚴格的教育。」（註一〇〇）馬克思的這一主張至少使中國大陸從一九五〇至一九八〇的三十年間，深受影響。在標榜「向人民學習」口號下，教育斷代，問題嚴重。

「哥達綱領批判」中被認爲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段，是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辦變爲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度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註一〇一）綱領沒有談革命專政，馬克思不滿意。這一段是共產黨人最樂意引用的。

六、從現代修正理論看馬克思批判拉薩爾

在共產主義與自由世界學者陣營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對比，就是共產世界學界罵拉薩爾的口氣和立場是一致的，而大部分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和後來列寧的說法，完全亦步亦趨，不敢逾越。自由世界學者正好相反，大致對拉薩爾都作肯定的評論，尤其對於他的人格和私生活，很少諷評。

列寧是依照馬克思說法，從哲學、民族問題、修正主義等多方面，對拉薩爾抨擊最力的一位。列寧說馬克思和拉薩爾都是青年黑格爾派，但「馬克思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七年，離開黑格爾走向費爾巴哈，又進一步從費爾巴哈走向歷史辯證唯物主義。」拉薩爾則成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俘虜，終生未能擺脫他的桎梏，「完全用黑格爾頭足倒立的觀點來解釋歷史。」（註一〇二）

至於拉薩爾所主張的德國統一問題，列寧和馬克思一樣，認為拉薩爾是「縱容了地主和普魯士民族主義，為普魯士利益而背叛工人運動。」他對於恩格斯斥責拉薩爾幫助封建貴族對農村工人宗法式的「憑棍棒維持的剝削」，也極為讚揚。(註一〇三)列寧更把拉薩爾和考茨基同等看待，就主張調和、議會選舉、通過和平民主等手段，大力抨擊。(註一〇四)

一九六七年馬克思「資本論」出版一〇〇週年，沃爾夫教授(Bertram D. Wolfe)以「馬克思主義教條百年」(Marxism: 1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Doctrine)，成一鉅著，其中論馬克思與拉薩爾關係，有二部分。

第一，馬克思與恩格斯來往書信間，對拉薩爾充滿侮辱謾罵名詞。例如「猶太黑奴」(Jewish Nigger)、「小猶太雜種」(Little Jew Braun)、「大老闆跟班」(Baron Izzy)，以及「畜牲」、「蠢貨」等稱呼拉薩爾，殊非在一般評論者(Commentators)間所能找到的例子，顯然有失一個正當學者的身分。(註一〇五)

第二，馬克思建立第一國際時，已近五十歲，當然屬於「成年馬克思」(Mature Marx)，但做法上極不成熟。他和最正派的英國工人運動者在第一國際內每一個人都發生爭吵，他無原則的為「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辯護，最後和每一工運領袖都疏離。另一方面，他又從事兩面苦戰。一邊和拉薩爾派苦戰，禁止國際和在德國本土有極大勢力的拉薩爾派工運者有任何聯繫，一邊和法國的國際分部成員作無休止的戰鬥。究其原因，都是認為別人或多或少趨向修正改良主義。(註一〇六)

第三，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抨擊拉薩爾思想，事實上拉薩爾主張多處引自「共產黨宣言」，教育問題即其中之一。由「綱領」評估馬克思思想，並未超過馬克思所攻訐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利葉、歐文所學說範疇。沃爾夫特以「烏托邦科學？」為專章論述馬克思思想。(註一〇七)

一九八八年這一年，共產世界變化大於自由世界。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蘇共紀念革命七十週年，召開國際共產圓桌會議，參加世界共黨及左派組織一七八個，內正式共產黨一〇八個，代表全世界共產黨員八千八百餘萬人，佔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八。這許多共產黨員中，中共最多，計四千六百餘萬人，蘇共其次，計一千九百餘萬人，掌握政權者二十五國。

這些共產黨員共同遭遇的困擾，是如何突破馬克思主義正統教條，走向修正改良主義。鄧小平「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趙紫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目的相同，說法有異。比較說得最露骨的，是一九八〇年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戈

巴契夫的「新思維」(Perestroika)，譯錄其主張修正改良的片段，作為本章結束。

我要一再指出的是，我們一切改革措施都是與社會主義者的選擇相一致的。我們的一切追求努力都在社會主義規範之內，決不逾越已提出的答案之外。我們估量成功或錯誤都站在社會主義者標準上去看問題。想要我們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的人，一定會大感失望。「新思維」的每一部分都建立在更多社會主義與更多民主的原則上。

更多社會主義意謂更多創造活力，更有組織紀律，更合乎科學方法，更有行政效率，更為經濟企管化以及人民生活更豐裕。更多社會主義意謂要更民主，日常生活上更開放與集體主義兼顧，更尊重個人尊嚴。更多社會主義意謂著更愛國與更具有崇高理想，國民個人活動要更與國家利益相一致，對國際事務發生更積極的影響。(註一〇八)

註釋

- 註一：George Brandes, *Ferdinand Lassall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881) p. 9.
- 註二：Ibid., p. 8.
- 註三：Ibid., p. 11.
- 註四：Ibid., pp. 13-14.
- 註五：參閱張文煥，拉薩爾評傳，(「人民出版社」，六〇三廠印刷，一九八三)，頁一七。
- 註六：Brandes, op. cit., pp. 21-23.
- 註七：前揭張文煥書，頁三一。
- 註八：丁建弘，拉薩爾，(北平：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二)，頁四。
- 註九：Brandes, op. cit., p. 30.
- 註一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頁六五三—六五五。
- 註一一：為拉薩爾聲辯的四篇專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一九六五年版)，題名均為「拉薩爾」。
- 註一二：轉錄前揭張文煥書，頁六、七、九。取材自「拉薩爾日記」，一九〇一年聖彼得堡俄文版第二四四、二五一頁。
- 註一三：Brandes, op. cit., p. 16.
- 註一四：Ibid., pp. 98, 99.
- 註一五：弗·梅林著，青載繁譯，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三卷(一八六三—一八六九)(北平：三聯書店，一九六五)，頁九三。
- 註一六：同右書，頁九二。
- 註一七：同右書，頁一一三。
- 註一八：盧特維希著，張治文譯，俾斯麥傳(臺北：文化圖書，民五五年)，頁二〇二。
- 註一九：同右書，頁二〇八。
- 註二〇：同右書，頁二〇五。
- 註二一：同右書，參閱頁二〇五、二〇六。
- 註二二：同右書，頁二〇四、二〇五。
- 註二三：Brandes, op. cit., Chapter VIII.
- 註二四：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法王路易·菲力蒲逃往英國，法國成立第二共和。革命風潮傳至奧國，三月十三日梅特涅亦逃往英國，奧王被迫成立自由資產階級內閣。三月十三至十六日柏林羣眾聚集街頭，威廉親王下令軍隊對羣眾射擊，親王亦逃英國，普王被迫撤走軍隊，召開國民議會，成立以大資本家康普豪森為首的自由派內閣，普王向街頭陣亡者脫帽致哀。
- 註二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五，頁六五二。
- 註二六：同右書，頁四七五。馬克思原指望康普豪森(Camphausen, Ludolph 1803-1890)實行國會的「專政」，可謂「空想」。
- 康氏為德國銀行家，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領袖之一，一八四八年三月至六月任普魯士首相。馬克思認為，康普豪森應

該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革掉王室貴族的命，他反而「竭力用欺騙手段來消滅革命民主成果，成爲反革命野心的工具。」結果他不過是一個「受了騙的騙子手」，使他的繼者屬於於普魯士親王。見同書頁一一二、一一三。

註二七：關於科倫審判案，七月初科倫檢察機關對「新萊茵報」第一次提出控訴，因六月分該報讚揚柏林人民襲擊軍械庫，呼籲國民議會廢除封建王朝。次年二月審判的結果，該報侮辱檢察官魏費爾和憲兵，均被判無罪。九月二十六日科倫戒嚴，「新萊茵報」被查封，十月三日戒嚴解除，報紙於十月十二日復刊。該次審判同時判決恩格斯於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七日在沃林根羣衆大會上，號召羣衆起來革命的煽動叛亂罪爲無罪，不過普魯士國家檢查官於十月三日下令逮捕恩格斯，恩格斯逃赴布魯塞爾，仍被捕入獄，押送法國邊界，流亡巴黎。馬克思則以「外國人」身分未被捕，繼續他對普魯士政府的攻訐。可見普魯士當時有相當程度的言論自由和民主，比諸現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制與鉗制言論自由，不可以道里計了。

註二八：「馬克思致斐迪南·拉薩爾」，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頁五〇九、五一〇。

註二九：梅林著，樊集譯，馬克思傳，（北平：「三聯」，一九六五），頁二二五。

註三〇：同右書，頁二二六。

註三一：「馬克思致斐·弗萊里格拉特」，馬恩全集卷二十七，頁五二七。

註三二：「馬克思致恩格斯」，馬恩全集卷二十九，頁三八五、三八八。

註三三：「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馬恩全集卷三十六，頁六九五。

註三四：前揭張文煥書，頁二五，取材自「海涅全集」俄文版第十卷（一九五〇），頁一九一、一九四。

註三五：同右書，頁二六，轉引海涅全集頁二六九—二七〇。

註三六：「恩格斯致馬克思」，馬恩全集卷二十八，頁二二九、二三〇。

註三七：「恩格斯致拉法格」，馬恩全集卷三十四，頁四一九。

註三八：前揭梅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卷二，頁一四、一四八。

註三九：馬克思，「拉薩爾」，馬恩全集卷六，頁三一六、三一八、三二一。

註四〇：恩格斯，「拉薩爾」，同右書，頁五四五。

註四一：Brandes, op. cit., p. 113.

註四二：Ibid., pp. 32-33.

註四三：「馬克思致拉薩爾」，馬恩全集卷二十九，頁五四〇、五四一。

註四四：威柏爾著，詹文滸譯，西洋哲學史，民二二年，商務，頁二一。

註四五：同右書，頁二二。

註四六：仰哲出版社哲學編譯組，古希臘羅馬哲學選輯，新竹，民七〇年，頁一七。

註四七：同右書，頁一九—二七。

註四八：Brandes, op. cit., p. 33.

註四九：Ibid., p. 36.

註五〇：Ibid., p. 37.

註五一：Ibid., pp. 37-39.

註五二：前揭張文煥書，頁六三。

註五三：「馬克思致拉薩爾」，馬恩全集卷二十九，頁五二七。

註五四：見馬恩全集卷二十九，頁二七三。馬克思一八五七—五八年經濟學手稿，是五十年代初他便著手的經濟研究，目的在論證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部問題。這本書一再修改，以後擴充成「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

註五五：同右書，頁五三一。

註五六：同右書，頁四二一。

註五七：同右書，頁五六三。

註五八：同右書，頁四〇〇。

註五九：同右書，頁一一〇、一一一。

註六〇：同右書，頁一二九。但此處恩格斯所說「將激動人心」那本書，是拉薩爾另一本書「弗蘭茨·馮·濟金根」劇本。

註六一：梅林前揭書，頁二二六。

註六二：同右書，頁七〇五、註一九四。

註六三：David Fernbach, E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74, pp. 20, 21.

註六四：Ibid., p. 21.

註六五：「馬克思致施章澤」，馬恩全集卷三十一，頁五五七。

註六六：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ranslated from the Polish by P. S. Falla

- London Press. Oxford, 1978, pp. 239, 240.
- 註六七：「馬克思致庫格曼」，馬恩全集卷三十一，頁四五五。
- 註六八：「馬克思致魏德邁」，馬恩全集卷三十一，頁四六五、四六六。
- 註六九：Kolakowski, op. cit., p. 239.
- 註七〇：馬克思，「柏林危機」，馬恩全集卷六，頁五、六。
- 註七一：張文煥前揭書，頁一一六，轉錄自拉薩爾全集一九一九年柏林德文版，第二卷，頁一九六。
- 註七十二：同右書，頁一一八。
- 註七十三：G.D.H. Cole,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Marxism and Anarch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9, pp. 77, 78.
- 註七十四：Ibid., pp. 78, 79.
- 註七十五：Ibid., p. 80.
- 註七十六：Ibid., p. 79.
- 註七十七：David Fernbach, op. cit., pp. 9, 21.
- 註七十八：「恩格斯致馬克思」，馬恩全集卷三十，頁四一九。
- 註七十九：「馬克思致恩格斯」，同右書，頁四二二。
- 註八〇：Brandes, op. cit., pp. 27, 89, 102.
- 註八一：Ibid., p. 90.
- 註八二：「馬克思致恩格斯」，馬恩全集卷三十，頁三三、三四。
- 註八三：「馬克思致蘇菲婭·哈茨費爾特」，馬恩全集卷三十，頁六六九。
- 註八四：「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十一，頁四五四、四五六。庫格曼為德國醫生，馬克思好友，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馬克思回德革命時，他是參加者，第一國際會員，國際一八六七年洛桑大會，一八七二年海牙大會，他都是參加者。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年間，和馬克思有大量通信。
- 註八五：威·李卜克內西著，舒昌善譯，一個革命士兵的回憶，（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九月），頁一九三、一九四。
- 註八六：同右書，頁二八八。
- 註八七：Minutes, *Document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64-1866*.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p. 256.
- 註八八：Ibid., pp. 257, 258.
- 註八九：Ibid., p. 434, Explanatory Notes, No. 289.
- 註九〇：「馬克思致威·李卜克內西」，馬恩全集卷三十一，頁四九〇。
- 註九一：「馬克思致恩格斯」，同右書，頁一三九。
- 註九二：G.M. Sekloff,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London: Martin Lawrence, 1928, p. 60.
- 註九三：Ibid., p. 385, Rycence Notes, No. 58.
- 註九四：「恩格斯致馬克思」，馬恩全集卷三十一，頁三一五。
- 註九五：「馬克思致恩格斯」，同右書，頁四二六。
- 註九六：Albert Fried & Ronald Sanders, Edited. *Socialist Thought: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4. pp. 423, 424.
- 註九七：Michael Harrington, *Socialis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2, p. 65.
- 註九八：「恩格斯給奧·倍倍爾的信」，馬恩全集卷十九，頁四一六。
- 註九九：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恩全集卷十九，頁二六、二八、三三。
- 註一〇〇：同右書，頁三三。
- 註一〇一：同右書，頁三一。
- 註一〇二：列寧，「拉薩爾『愛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卷三十八，北平，一九六〇年第一版二刷，頁三八六。
- 註一〇三：列寧，「馬克思的學說」，列寧選集，第二卷，北平，「人民」，一九六〇年，頁六〇五。
- 註一〇四：最足代表的作品之一，是列寧一九一五年五、六月間所寫，「第二國際的破產」。見列寧全集，卷二十一。
- 註一〇五：Bertam D. Wolfe, *Marxism: 1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Doctrine*. London, Chapman & Hall, 1967. p. XXV. 有關馬克思辱罵拉薩爾之無聊言論，可參閱「The Jewish Nigger」. in Edward Hallet Carr, *Karl Marx: A Study in Fanaticism*, London, 1938, Chapter XI.
- 註一〇六：Ibid., p. 161.
- 註一〇七：Ibid., p. 336.
- 註一〇八：Mikhail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7, pp. 36, 37.

註八八：Ibid., pp. 257, 258.